

日治時期的報業發展

文／李承機（國立成功大學臺灣文學系副教授） 圖片提供／國立臺灣圖書館



▲ 1921年臺灣文化協會成立，公推林獻堂（坐右4）為總理，蔣渭水（坐右5）為專務理事。（圖片提供／林柏維）

從「量」的發展角度觀之，日治時期臺灣的報業約略經歷四個主要的歷史分期，分期依據則為全島人口數與島內日刊配布總數的長期相對數據（參照附表）。在各個時期，臺灣總督府的媒體政策及臺灣的社會變遷皆對報業發展有所影響，本文即以下述四個分期為縱軸，並以各時期媒體政策、社會狀況及報業市場的變化為橫軸，描繪出日治時期報業發展的簡要輪廓。

另因歷史現場的法律用語及定義之故，本文所稱的「報業」（journalism）乃當時日本帝國及殖民地臺灣法律所規定之「新聞紙」經營事業。由於未受相關法律認定為「新聞紙」者不得從事「時事」（即新聞或 news 之意）的報導及評論，因而有相當數量卻屬「文藝雜誌類」者，並未能歸類在「報業」之列。

移植自日本本土的草創期（1896～1919）

清治時期未曾出現以臺灣全島為主要市場的近代式新聞傳播媒介，最早以活字印刷大量複製為基礎而具有大眾傳播意義

的報紙，乃日本殖民統治宣布「始政」一周年後，於1896年6月正式創刊的《臺灣新報》。該報在殖民政權尚未穩固時即已創刊，充分顯示明治維新後已擁有資本主義報業的日本，相當有意圖的將近代式的報業移植來臺。自此以後，臺灣北中南三個主要城市也陸續有數種日、週、旬刊等出現。另一方面，因應在臺日本人的新聞需求，日本本土發行的各種報刊也持續「移入」到臺灣。

《臺灣新報》在1898年5月與同在臺北發行的《臺灣日報》，合併成為《臺灣日日新報》（以下簡稱《臺日》），從此成為貫穿日治時期臺灣的第一大報。該報長期雄據「最大」之座而被稱為「天下的臺日」，實為時任總督府總務長官後藤新平強力介入報業市場之結果。後藤在同年3月甫到任時即表示需要緊縮新聞媒體的政策思考，甚至認為殖民地的媒體政策應與本國相異，扶植《臺日》成為「御用新聞」即具體的政策落實。後藤緊接著花了一年餘的時間與本國內務省相關單位折衝，在1900年1月公布並實施僅限臺灣適用的臺灣新聞紙條例。

相較於日本本土新聞媒體相關法令中的創刊發行報備制，以及與發行同時進行檢閱等制度，臺灣新聞紙條例之中舉凡創刊發行許可制、發行前的事前檢閱制度、全面性的保證金制度、（自外國）輸入／（自其他日本帝國治下區域）移入相關限制及檢閱等，皆顯現出極為嚴苛的統制色

彩。此後，延伸至出版、電影、廣播、唱片等媒體相關法令，整個日治時期臺灣的媒體政策在條文上從未見到任何放寬。後藤也以避免過度競爭為名，搭配這項統制報業的利器，逐漸將臺灣的報業緊縮到以三日刊「御用新聞」為主。臺北發行的《臺日》，加上臺中的《臺灣新聞》（1901年以《臺中每日新聞》為題創刊），以及臺南的《臺南新報》（1899年以《臺澎日報》為題創刊），長期被並置為殖民地臺灣的三大報，也分別被習慣性稱為《北報》、《中報》、《南報》；另一帶有諷刺性的稱呼，則是把三報統稱為「御用三紙」。

此時期的報紙消費者以官署、日人及部分臺人仕紳為主，從經營角度看來，報業在識字率不高的臺灣難以發展，似乎也讓後藤稱臺灣需要「殖民地特有」媒體政策有其論據。但實際上，1909年以前仍有以在臺日人民間資本為主體的「民間紙」與「御用三紙」正面競爭，即使之後日刊市場中「民間紙」全然消失，也尚有日本本土發行卻以臺灣為主要市場的月刊「民間紙」存在。這些所謂「移入紙」由於可在日本本土直接適用報備制創刊發行，成為嘗試突破總督府媒體政策的方法，而這種經營模式也為日後由臺人資本經營的《臺灣民報》系列所採用。

報業市場漸趨穩定的展開期（1920～1931）

1910年代中期日本出現「大正民主」風潮，本國政治場域也在1918年出現首位「平民宰相」，隔年首位文人臺灣總督田健治郎到任，本國較為「開明」的政治



▲《臺灣青年》雜誌是第一個臺灣人所創辦的報刊，也是1920年代政治運動的重要宣傳媒介。（圖片來源：臺灣民報）

氣氛似乎也飄到臺灣。就報業部分而言，大約可以觀察到1920年代以後「御用三紙」版面上偶見批評時政的言論，以及報導類記事的比重日漸增加，在實務上本土發行的報刊也較少直接遭到禁止移入臺灣。

1920年由臺人知識分子在東京創刊的《臺灣青年》，日後發展成為《臺灣民報》系列而經歷月刊、半月刊、旬刊、週刊等階段，並在1932年達成日刊化。

在1927年獲許可在臺灣島內發行前，該報即採東京發行再移入臺灣的方式，並依據臺灣新聞紙令被認定為島外發行，而以臺灣為主要市場的「移入紙」。臺灣新聞紙令自1918年1月實施以取代臺灣新聞紙條例，但其中的統制色彩並未改變，甚至因加上認定「移入紙」的相關規定，好像在《臺灣民報》系列創刊前，即已預告臺人所主導的報刊遲早會利用島外發行來突破總督府的媒體統制政策。

《臺灣民報》系列從創刊之初即肩負起政治、社會運動側翼的角色，但就整個報業市場而言，以週刊之類的發行模式不會對「御用三紙」造成威脅。由於在新聞的即時性上落後島內日刊甚多，《臺灣民報》系列只好採側重評論的路線以發揮「言論機關」本色。「御用三紙」在此時期所畏懼的其實是日本本土發行的全國性大報直接移入至臺灣。即使自本土以海運移入到臺灣至少有三天的時間差，以《大阪朝日新聞》與《大阪每日新聞》為代表的全國性大報，對在臺日人仍有相當吸引

力。因而從1920年代中期開始，「御用三紙」的販賣經銷策略也轉向開拓臺人讀者，版面上的具體改變就是加強報導臺灣島內各地方消息的地方欄。

這段時期較屬硬體建設的變化，包括各項鐵道、公路、電信、郵政等基礎建設的整備，使報業經營得到相當便利的全島性流通管道。在經濟方面，雖然1927年中以降景氣突然轉壞，但一次世界大戰所帶動的景氣擴張下各項工商業的發達已促使情報需求穩定增加。社會面則有初等教育日漸普及所造就的識字率上升，1920年代末期臺灣人的識字率推估僅約三成，進入1940年代之前卻快速上升到逼近五成，這也是下一個分期裡報業市場急速成長的要因之一。

報業市場急速成長競爭期 (1932~1937)

1932年4月標榜「臺灣人唯一日刊新聞」的《臺灣新民報》(以下簡稱《新民報》)發刊後，臺灣的日刊市場立即出現激烈競爭。當時共有五個日刊(加上「御用三紙」及1924年日刊化的《東臺灣新報》)同時發行，其中僅《新民報》為百分之百由臺人資本經營，基於殖民地臺灣在的民族對立結構，該報被預期對既有的日刊市場帶來衝擊。日刊化後《新民報》的每日平均配布數迅速超越《南報》與《中報》，1934年以降更開始逼近《臺日》。

號稱「天下兩大新聞」的《大阪朝日新聞》和《大阪每日新聞》，也早在1920年代中期積極在臺灣擴張販賣規模。總督府許可《新民報》發行日刊的同時，更許可「天下兩大新聞」在臺灣不定期發行「號



▲府報以《臺灣日日新報》附錄的形式發行。

外」。這兩報因尚未能在臺灣從事正式的印刷與發刊，該「號外」彌補了自本土移入的即時性不足。1933年底「天下兩大新聞」更分別開設「臺灣版」(將原有的「地方版」置換成臺灣支局所編輯的版面)，可認為已正式投入臺灣日刊市場的競爭。

總督府的政策改變，造成長久盤踞臺灣日刊市場的「御用三紙」高度緊張，因

此更加致力在版面改革、電報通訊、通信社契約、廣告開發、籌辦新聞事件(media event)等各種刺激市場的作為，並同時在臺灣報業市場中確立「速報主義」的經營原則。此外，自1930年總督府新許可數種週刊「新聞紙」，如同「報導的日刊、政論的週刊」這種說法，這些週刊自成一個與日刊「速報主義」相區隔的市場，甚至十足呈現與日刊對立的態勢。在最興盛的1936年時每週共有八種週刊同時發行，合計平均配布數高達3萬餘，其中不乏標明「黃色新聞」而走小報路線者。

從數字上看，1930年臺灣島內發行日刊的每日平均配布總數接近7萬份，至1937年與隔年的高峰時已成長超過兩倍而突破16萬份，若加上「天下兩大新聞」在臺每日平均配布總數合計約近4萬份，每日被消費的日刊報紙已超過20萬份。相對於該期間臺灣全島人口僅從468萬成長至575萬左右，確實說明報業間的競爭帶動了整體市場的快速成長。

戰爭動員體制下報業收縮期 (1938~1945)

隨著國際局勢的緊張與日本軍國主義的抬頭，一反1919年以來的文官總督，

1936年中武官總督小林躋造至臺灣上任。隔年七七事變發生，以及1938年4月國家總動員法公布(5月延長實施至臺灣)，日本帝國逐漸走向戰時體制，臺灣被賦予帝國「南進」基地之使命，「皇民化」也成為總督府的具體政策方向。

影響臺灣報業的政策因素從漢文欄的存廢問題開始，在臺灣軍司令部施加壓力下，1937年4月島內各大日、週刊共同宣布廢止漢文欄(《新民報》延至6月實施)。七七事變後軍部立刻介入新聞檢閱及取締工作，至同年底累計共有島內發行的六種「週刊新聞」受到發行許可取消處分而停刊，亦有四種「移入紙」被取消移入許可。

但日刊的總配布量在1938年仍呈增加趨勢，主因戰爭氣氛易刺激人們對時事的關心，七七事變後臺灣的廣播收聽者與日刊銷量雙雙呈現「激增」現象，似乎對報社也是提高獲利的機遇。然而，臺灣的

日刊報社實際感受到的卻是用紙價格高漲、廣告減少、戰爭相關電報通信支出增加等不利狀況。加上依循「速報主義」而與本土發行的全國性大報競爭，不得不將特派記者送往戰地，從中也產生通信費與津貼等額外的成本支出。因此，當七七事變始料未及的成為長期戰爭，各報社的經營成本反倒不斷提高。

最後，在戰爭體制的籠罩下臺灣各大日刊都以相近的方式維持經營，構成戰爭報導的版面上各種「特電」或「特稿」其實都來自相同的新聞來源，加上日漸緊縮的報導管制，使得各報愈發失去特色。至1940年左右，連《新民報》也失去承載臺灣人社會「輿論」的功能，所有島內日刊在媒體性格上已無太大差異。1944年全島六日刊被統合整併成《臺灣新報》，該報名與日治時期臺灣最早的日刊相同，正好預告日本殖民統治的「有始有終」。

附表：臺灣島內人口、日刊報紙配布數

年	A	B	C	D	E	全島人口/ 島內日刊平均 配布數合計 (A/E)
	全島 人口數	臺灣人 (本島人)	在臺日本人 (內地人)	島內日刊 年間配布數 合計	島內日刊 每日平均 配布數合計	
1900	2,846,108	2,707,322	37,954	2,431,321	9,210	309.04
1905	3,123,302	3,055,461	59,618	5,773,354	20,075	155.58
1910	3,299,493	3,186,605	98,048	7,822,286	25,233	130.76
1915	3,569,842	3,414,388	137,229	9,770,940	29,194	122.28
1920	3,757,838	3,566,381	166,621	15,766,017	46,405	80.98
1925	4,147,462	3,924,574	189,630	19,818,666	58,566	70.82
1930	4,679,066	4,400,076	232,299	23,038,310	68,904	67.91
1931	4,803,976	4,514,820	243,872	20,932,522	62,850	76.43
1932	4,929,962	4,639,226	247,569	29,866,866	94,103	52.39
1933	5,060,507	4,759,197	256,327	35,733,154	107,788	46.95
1934	5,194,980	4,882,288	262,964	42,302,975	131,209	39.59
1935	5,315,642	4,990,131	269,798	47,401,678	135,461	39.24
1936	5,451,863	5,108,914	282,012	55,140,845	156,964	34.73
1937	5,609,042	5,261,404	299,280	59,169,000	163,000	34.41
1938	5,746,959	5,392,806	308,845	59,938,560	165,120	34.80
1939	5,895,864	5,524,990	323,148	57,224,236	158,078	37.30

(依據各年度《臺灣總督府統計書》筆者作成)